

文学与史书
当代从

50—70年代中国 文学经典再解读

李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与
当代史
丛书

丛书主编
洪子诚

50—70年代中国 文学经典再解读

李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 李杨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29531-1

I. ①5…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450号

- 书 名**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50—70 NIANDAI ZHONGGUO WENXUE JINGDIAN ZAI JIEDU
- 著作责任者** 李 杨 著
- 责任编辑** 黄敏劼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531-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印 刷 者**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毫米×960毫米 16开本 23印张 312千字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7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第一章 《林海雪原》

- “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
分裂与冲突····· 1
- 一、“英雄”····· 4
- 二、“儿女”····· 13
- 三、“鬼神”····· 19
- 四、“旧瓶”与“新酒”····· 27

第二章 《红旗谱》

- “成长小说”之一：“时间”“空间”与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32
- 一、“成长小说”视阈中的朱老忠形象····· 34
- 二、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 46
- 三、“田园诗”与“历史小说”····· 60

第三章 《青春之歌》

- “成长小说”之二：“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 82
- 一、政治叙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84
- 二、《青春之歌》的另一种阅读方式：情爱叙事····· 98
- 三、“成长小说”：在“性”与“政治”之间····· 115

第四章 《创业史》

- “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 125
- 一、在两种革命之间····· 128
- 二、“旧农民”序列····· 132
- 三、新农民形象····· 139
- 四、梁生宝与梁三老汉····· 152

第五章 《红岩》

- “红色圣经”中的现代性革命····· 160
- 一、“革命不回家”····· 162
- 二、“个体”与“神性”····· 171
- 三、“身体的意识形态”····· 174
- 四、“虐恋”与“向死而生”····· 179

第六章 《红灯记》

- “镜像”中的“自我”与“他者”建构····· 193
- 一、“样板戏”：在“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
与“乌托邦”之间····· 193
- 二、《红灯记》的版本沿革：从电影、沪剧到京剧····· 201
- 三、“镜像”中的“自我”····· 212
- 四、“镜像”中的“革命”····· 223
- 五、“京剧”与“革命”····· 234

第七章 《白毛女》

- 在“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 243
- 一、文本生产过程····· 244
- 二、歌剧《白毛女》中的“政治革命”····· 252
- 三、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文化革命”····· 263
- 四、“文化革命”视野中的“延安文艺”····· 272

第八章 《第二次握手》

- “地下文学”的三种叙事方式：言情小说、
政治叙事与民族寓言····· 284
- 一、言情小说中的“男人”与“女人”····· 286
- 二、政治叙事中的“知识分子”与“党”····· 297
- 三、民族寓言中的“中国”与“西方”····· 314

附录 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

- 《乘风破浪》再解读····· 326

主要参考书目····· 351

2002年版后记····· 355

第一章 《林海雪原》

——“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①

“革命通俗小说”是50年代中前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类型，主要包括《铁道游击队》（知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出版）、《林海雪原》（曲波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敌后武工队》（冯志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烈火金刚》（刘流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出版）等等作品，由于多以传统小说的手法来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因此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的批评家一方面指出这些作品“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化、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②，因而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批评家冯牧、黄昭彦认为：“这类作

^① 《林海雪原》，曲波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重版过程中曾对原作作过多次文字上的修改。本章分析采用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再版本。

^②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品着重于情节的惊险曲折，而人物性格则比较单薄，但由于情节的引人入胜，故事性强，也有一定教育意义，容易收到普及的效果，它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过去泛滥着黄色书刊和旧式侦探小说的阵地，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积极作用是不容许我们忽视的。”^①

自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中，通俗文学一直是作为新文学的“他者”存在的，通俗小说更是新文学穷追猛打的对象，由于通俗小说深受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民众的欢迎，以至“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②，因此，要批判“国民性”，当然不能放过这些通俗小说以及潜藏于其后的意识形态。向来激烈的梁启超认为：“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③周作人更干脆称“新文学”为“人的文学”，将作为“迷信的鬼神书类”的《西游记》《封神传》、“妖怪书类”的《聊斋志异》、“强盗书类”的《水浒传》等等的通俗小说归入“非人的文学”一类。在他看来，这些小说“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背景，这些在新文学中被“批倒批臭”的传统通俗小说在50年代穿上“革命”的外衣死灰复燃，甚至几成燎原之势，算得上是革命文学的奇观，也因此一度成为“文革”后的评论家将社会主义革命定性为“封建文化”的重要口实。只是隐含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传统”与“革命”的关系远比这种简单的解释要复杂得多。事实上，50年代主流批评家对这种文体的褒扬大

①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北京）1959年第19期。

② 鲁迅：《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④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

都十分节制，至多只是从“普及”的角度予以肯定，与此同时，针对《林海雪原》这一类作品的大量批评意见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些批评意见不仅来自职业批评家，更来自工厂和农村的普通读者。更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末期以《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代表的“成长小说”的兴起，“革命通俗小说”便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对这一如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的文学史意义，文学史家显然注意不够。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这一类小说在50年代前期的繁荣解释为这一时期文学政策上的“犹疑摇摆”导致的结果，认为“1958年以后，对‘通俗小说’的这种松动，又重新‘收紧’”^①。显然只是从文学的“外部研究”中获得的结论，而“革命通俗小说”这一文体内部蕴涵的“传统”与“革命”的融合、龃龉乃至冲突以及这一文体在50年代小说文类的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能都存在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林海雪原》是“革命通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出版后不到一年就销售了五十万册。《林海雪原》的风行，显然与小说中的通俗小说元素有关。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类型化的人物塑造、“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以及“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方式、情节与叙事节奏上的章回小说痕迹、使用大量“巧合”造成的传奇效果、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等等，都再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风采。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曾将中国传统小说分为“英雄、儿女、鬼神”三类^②，侠人在对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时也指出：“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此中国之所短一。”^③《林海雪原》对“英雄”“儿女”“鬼神”这三类中国传统小说母题的借用和改造，以不可替代的方式凸现出“革命”与“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② 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五、第七至十一号（1912年）。

③ 见《小说丛话》中侠人语，《新小说》第13号，1905年。

一、“英雄”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小说、戏剧，通称传奇。“传奇”以情节丰富、新奇，故事多变为特色。中国小说的传奇性，正是传统美学在小说艺术中显现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情节的魅力在中国叙事艺术中往往比在西方叙事艺术中更受重视。传奇意味着在艺术对现实的把握中，摈弃那些普遍的平凡的生活素材，选取那些富于戏剧性的生活内容，并以偶然和巧合的形态显现。英雄传奇既多虚构，而且其人物又是理想化了的英雄，所以免不了要用夸大的笔法，为他们的行为涂上一层怪异的、超常的或神奇的色调。在有关《林海雪原》的创作谈中，只读过六年书，十多岁就参加了革命的曲波坦承自己的文学知识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外国小说，而是来自于类似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①曲波提到的这几部作品都是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著名的“英雄传奇”，《林海雪原》直接效仿了这种诞生于元末明初的“英雄传奇”及其演化出的诸多变种，如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乃至侠义公案小说等等。

无论在文体还是在主题上，《水浒》式的“英雄传奇”都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中的“史诗”（epic）或“英雄史诗”（heroic poem），由“英雄传奇”演化出的“侠义小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关于侠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理论家的归纳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不会缺少血债与报恩复仇这些基本的元素。在经典的侠义小说中，血仇——通常是主人公遭逢的杀父或灭门之仇常常是叙事的起

^① 曲波在《关于“林海雪原”》一文中说：“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精神气概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这些作品，在一些不识字的群众间也能口传。因此看起来工农兵群众还是习惯于这种民族风格的。”此文见《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点，幸存的主人公走上了漫漫的复仇之路，手刃仇敌成为主人公生存的唯一意义。“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报恩与复仇历来是侠义小说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侠”的观念渊源于原始正义观念，即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所尊奉的观念，因此，摩尔根认为“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①由此可见，这种报恩仇的侠意识并非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然而，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报恩复仇却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体的社会形式的重要表现方式。只有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中，为亲复仇才在“尽孝”的同时具有为国“尽忠”的意义。在儒家思想中，忠孝一体，孝悌为本，基本的原理是“移孝作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为亲人复仇体现出“血缘”的神圣不可侵犯。由于“血缘”是由家及国的起点、基石和范型，是“人”确立自身的基本依据，因此，以“义”为道德出发点的侠客只能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英雄。这也是西方武侠小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与戏曲的不断传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也难脱窠臼，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武侠乱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杀人提供道义。《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为父复仇，修炼“辟邪剑法”，变得异常阴毒，杀人无数；《碧血剑》中的夏雪宜为父复仇，用过分残忍的方式杀灭仇家；《雪山飞狐》中四个家族，百年积仇，互相残杀无所不用其极；《天龙八部》中游坦之浑浑噩噩，报家仇的初衷却是很清楚……正因为为亲人“复仇”成为武侠小说最重要的元素，因此，“反武侠”与“解武侠”的小说常常以消解“复仇”这一元素为基本的手段。以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为例，金庸把主人公韦小宝写成了一个妓女的儿子，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安排。由于“无父”，韦小宝永远不可能遭逢困扰几乎所有武侠英雄人物的“杀父之仇”，而“无仇可报”的韦小宝也因此永远无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5页。

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侠义英雄，这也注定了以韦小宝这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鹿鼎记》根本无法发展成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可以说，金庸正是通过这样的错乱来达到彻底解构武侠世界的目的，用以完成对自己的武侠幻梦的彻底终结。因此，《鹿鼎记》的故事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为父复仇”以及“为亲人复仇”对于武侠小说的重要性。

许多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论述古代英雄传奇向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时，常常从《三侠五义》、王度庐一步跨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殊不知“英雄——武侠小说”传统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中并没有断流，以《林海雪原》为例，这部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同年出版的书讲述的是40年代末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奉命深入东北林海雪原清剿国民党残匪的故事，是“革命通俗小说”，却将一个现代意义的“革命”主题内置于一个古老的“报恩复仇”框架中，以此完成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①

《林海雪原》的第一章“血债”，写的是少剑波临危受命，率队驰援遭土匪袭击的村庄杉岚站，因为杉岚站驻扎着少剑波的亲姐姐鞠县长率领的一支土改工作队。少剑波父母早亡，是姐姐将他抚养成人。因此，姐姐的安危让少剑波心急如焚。当他纵马赶到杉岚站的时候，土匪已经逃逸，留下了乡亲们的尸体。少剑波疯狂地寻找着他的姐姐：

那位老人弯腰顿足喊着：“鞠县长！鞠县长！……”他悲愤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用手连连指着西山。

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去，绝望地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

“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

^① 《林海雪原》后来改编为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成为“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在《智取威虎山》中，原来隐含在《林海雪原》中的这个报恩复仇的故事被完全抹掉了。

剑波的脑子顿时轰的一阵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走！走！”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第8页）

赶到西山的少剑波见到的是被土匪吊在西山坡上的九具尸体，包括他的姐姐在内，“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

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零三！二零三！（“二零三”为少剑波代号，引者注）”一面哭泣，一面喊。

剑波用力张开眼睛，定了定神，刚想再向姐姐看一眼，突然一声亲切温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剑波同志！……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临行前刘政委叮嘱他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他紧咬牙关，没有眼泪，悲切的心变成冲天的愤怒。（第8页）

《林海雪原》是作者曲波根据自己40年代末期在东北剿匪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①主人公少剑波是曲波自我想象与自恋的产物。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于少剑波和小分队战士而言，剿匪是上级下达

① 作者曲波，1923年生，山东省黄县人。小时候只念过六年小学，13岁即失学在家打柴干农活。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东地区作战，曾任连、营指挥员。1943年进入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抗战胜利后，部队开赴东北，他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他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进行剿匪战斗。《林海雪原》显然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像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曲波也分不清“小说”与“历史”的界限——或者说，他有意混淆这两者的界限。小说扉页上的题词：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高波，更使人将《林海雪原》误解为一部“革命回忆录”。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不过“小说”与“历史”的差异，又实在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的任务。然而，曲波虚构出的“代父”的鞠县长这一人物，却使“剿匪”这一政治任务具有了伦理前提。小说的主人公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武侠小说的读者异常熟悉的情景中，与一股熟悉和亲切的文化气息重逢的读者与我们的主人公一同踏上正义的复仇之旅。在找到了这个重要的意义生长点之后，“剿匪”就不再只是“党”的任务，而同时还是——或许还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少剑波对自身的伦理道德要求：

控诉的人群里，他仿佛又听到姐姐的声音：有她少女时期对着孤灯劳动的咳嗽及低低呻吟声，有她动听的讲课声，有她参军后唱不尽的歌声，有“小波，小波！”温柔的呼唤声，有她和姐夫的谈爱声……他又好像觉得挂在他胸前的那个兜兜在跳动，这跳动的声音和他小时伏在姐姐怀里睡觉时听到姐姐心音的跳动声一模一样。但是，这所有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在说：“小波！别流泪！杀敌！报仇！”

悲痛，此刻已完全变成了力量，愤怒的火焰，从剑波的眼睛里猛喷狂射……（第19页）

这个时候的少剑波已经变成了一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复仇的子弹。当“剿匪”变成了“复仇”，外在的政治任务也就被有效地转化成了内在的道德要求。被土匪凶残地杀害的“鞠县长”，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县长，还是一个善良的“姐姐”，一个慈祥的“母亲”。事实上，少剑波的“血仇”还只是叙事的起点，从此以后的全部剿匪故事都是这一逻辑的展现，小说中所有的主要正面人物——无论是杨子荣这样的小分队战士还是普通的百姓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了他们最为内在的冲动，也成为叙事的动力与方向。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林海雪原》将政治使命转述为一个道德化的中国故事。“革命”穿上了“传统”的外衣。

一位批评家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叙事方式与现代革命的疏离：

由于作者不能很恰当地结合“私仇”与“公愤”——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不善于表现骨肉感情和革命感情的一致性，而在不知不觉间过分地突出了少剑波由于姐姐被杀而感到的痛苦，相对地冲淡了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亲人的感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①

不过，以《林海雪原》比附“英雄传奇”，多少有些不合卯榫的地方。像《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写的是民间豪侠义士的壮举，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主题，水浒英雄是“匪”而不是“官”，在这一点上，《林海雪原》似乎又更接近于英雄传奇的另一变种“公案小说”或《三侠五义》这样的“侠义公案小说”。侠义、公案本属两种不同题材的小说，前者写侠士们仗义助人，为民除害，考虑的是下层民众的利益，而后者则是维护封建法律，虽然也有为民雪冤的清官，但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公案小说有些类似于现代的侦探小说，描写案件侦破的曲折过程，歌颂清官的聪明才智。公案小说虽然早有记载，但真正形成规模并成为一种小说类型是在宋代。在宋代说书中，公案题材是极重要的一种，已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在公案小说中，侠客义士在接受清官的统领之后，其除暴安良的行为便不再仅仅具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性质，而是一种代表政府意志的活动。从艺术风格上看，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也有相近的地方：二者都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变化，主人公都充满智慧，并且神秘莫测，具有超常的能力，为故事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产生了其他类型小说所没有的那种独特的吸引力。至清代侠义与公案合流，侠士们终于变为官府手中的得力工具，完全改变了侠原有的性质。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中，清官与侠义代表着社会公正与正义，也是作者致君泽民的思想主旨的

① 何家槐：《略谈“林海雪原”》，《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体现者，侠士除暴安良的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众社会公正的愿望。而且，合流后的公案侠义小说变得智勇相兼，文武双全，愈发显得有声有色。

读者显然不难在《林海雪原》中体味这种侠义公案小说的神奇魅力，再度重温智勇双全的少剑波统帅的一群粗豪的勇士在党的领导下剿灭国民党残匪的传奇经历。事实上，无论是英雄传奇还是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体现的都是在忠奸、善恶、正邪等道德冲突上确立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在《林海雪原》中得以完整的呈现。代表正义力量的小分队战士诛奸除恶、为民除害、施财济困、见义勇为、疾恶如仇、助人为乐、知恩图报，这些民间伦理早已泛化于广大平民大众心中，成为民间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集中体现出这些美德的小分队实际上成为民间伦理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与被神化的英雄相对的土匪则是民间伦理的破坏者，在没有边际的非理性的烧杀掳掠活动中，将这些无恶不作、凶狠残暴、尔虞我诈的土匪统一起来的已经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带有变态色彩的超现实的兽性。

将政治的使命转换为一个道德的命题，既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同时亦可视为传统文学为革命文学提供的不可替代的资源。道德与政治的一体化是古代中国“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关系中，言国家之治的“政治”与言个人之修的“道德”连成一片，不但政治的权力道德化了，道德也被政治权力化了。道德被视为政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人有德即有天命，天命又与德性一致，故有德必能唤起百姓大众的共信与共识，形成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政治文化特点使政治的道德化成为传统政治寻求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在四五十年代，又再度为《林海雪原》这样的“革命通俗小说”所借用。

只是这一政治道德化的叙事，毕竟只是对传统意识形态修辞的“借用”。一种权宜之计，20世纪的中国“革命”毕竟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革命”，因而不可能真正为传统伦理阐释和说明。“革命”借传统伦理的母腹发育成长，终将破茧而出，在“样板戏”的舞台上自我证明、自我呈现。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罢了。

“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传奇里的英雄人物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林海雪原》中的英雄也由这两种类型构成，杨子荣、刘勋苍等小分队战士属于前一类，是所谓的“五虎将”似的英雄，少剑波则是典型的儒将式的人物。一群粗豪的勇士拱卫着这位“精悍俏爽、健美英俊”的“少帅”。这位二十二岁的主人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有科学知识，又有文学才华，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很自然成了民众的救星与小分队的灵魂。面对这样智勇双全的理想男性，天真的女护士白茹情不能禁，认为这位只有二十二岁的小首长，智慧那么多，胆魄那么大，却又那么谦虚，常常说：“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归功于群众”；杨子荣对少剑波的评价是：“就像你，二零三首长，由于你身经百战，所以你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你自己的两只拳头一样，这一点，我无论如何办不到”；小分队的战士对少剑波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欢腾若狂地嚷道：“我们二零三首长真是文武双全”；夹皮沟的老百姓更是将少剑波奉若神明：“这一来剑波在夹皮沟，已成了神话中的人物”，而剑波面对群众的个人崇拜，特地谦逊地作了一番解释，认为自己“只费了一番计划的力量”……

将革命小说的主人公刻画成周瑜式的英雄，即使是在5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也显得不合时宜。在各地报刊组织的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中，少剑波成为众矢之的。许多批评意见非常尖锐。大多数批评集中于少剑波的“个人英雄主义”，认为小说因此忽略了“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整部作品中，作者过分渲染了少剑波个人的指挥才能，极力描写他的惊人智慧和果断坚决，描写他的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有时甚至把他的个人作用夸大到使人